

体制和结构双调整中的日本经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勇明

内容提要：目前，各方研究者对日本经济现状的评估不一，对其发展前景的看法差异很大。日本经济现在还处在艰苦的调整过程中。调整绝不只是经济上和产业结构上的调整，体制、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调整更为重要。日本经济的“病根”在于政府主导的不完全竞争的经济体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考察日本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得失，可以得出日本应当放弃无所不包的生产模式，重点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根据国际分工的新格局来重新确立自己的产业优势的结论。对日本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双调整刚刚开了个头，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经济的转型尚未真正起步。日本不仅需要从微观上寻找新的增长点，更需要从宏观上调整战略。

关键词：日本经济 经济体制 产业结构 调整

当前，日本经济是世界上最有争议的经济。一部分人认为日本经济已经完全衰败并且无可救药，称日本已由“世界经济优等生”沦为“世界经济劣等生”。但也有相当部分的人认为，日本经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衰败，只不过是处于在由“追赶型经济增长”向“开拓型经济增长”转变的过程中，犹如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进入弯道而稍许放慢了速度罢了。更有人认为，日本经济衰退中有“猫腻”，并拿出许多诸如制造业水平及市场占有率、外汇储备、民间金融资产等日本仍然名列世界第一的经济指标来证明，称日本头面人物是为了争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实惠而在

“哭穷”。

“衰败论”、“转型论”和“哭穷论”各执一词,孰是孰非一时难下定论。但这三种观点中都不排斥“调整”一词。日本经济需要调整,也确实在进行调整。调整正在从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由此可以认为,应该认真地看一下日本经济在调整什么、用什么方法调整及调整出了什么结果。弄清了这三个问题之后,方可对日本经济的走向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

一、政府主导型不完全竞争

“政府主导型不完全竞争经济体制”曾是昔日日本经济辉煌的体制保障,同时也是当今日本经济不景气的体制根源。

“政府主导型不完全竞争经济体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政府的行政指导。不能不承认,日本的行政官员是一个社会精英的群体。这个群体不仅有着强烈的国家意识,而且埋头苦干。他们的窗口指导使日本得以成功地动员了所有社会经济资源,在短时期内实现了经济复兴,完成了追赶美欧的历史使命。然而,这种方式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走向了其反面,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妨碍了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官员个人自由裁决权的过度泛滥导致了官商勾结,其结果酿成了市场经济秩序的失控和混乱。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增量的大幅度上升能掩盖由市场失灵和官商勾结造成的经济和效率的损失,所以尽管那时有洛克希德案等丑闻发生,但还不足以动摇日本经济的根基。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增量有限,由体制和制度造成的效率低下这才明显凸现出来,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瓶颈”和顽症。

第二个方面是集团内企业互相持股。企业间互相持股是日本的大企业集团生存发展的基础。通过相互持股形成了以银行为中心的、包容各种企业的集团,通过资金链条把集团内各企业的生产、销售乃至高层人事都联系成一体。在资金不足和企业“体质”不佳的情况下,企业间的相互持股是一个有效的办法,能迅速形成规模,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间相互持股及由此带来的经营一体化也曾是日本企业在 20 世纪 70 年代横扫美欧的锐利武器。企业间相互持股与政府行政指导这两者的叠加,使日本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把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美欧不少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日本株式会社”。但企业间相互持股的消极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市场经济中内在的监督机制因此失灵。从宏观层面上讲,日本经济中的局部性和阶段性的垄断处处可见;从微观上讲,企业的董事会形同虚设,银行对企业坏账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泡沫经济破产以来揭出的众多丑闻无不同企业间相互持股有关。银行坏账的不断攀升恰恰反映了企业间相互持股的真实后果。出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考虑,对于经营不善的企业,银行只能不断地拿钱来填窟窿,明知有去无回,但也不敢轻易追讨欠账让其倒闭。

第三个方面是年功序列。所谓的“年功序列”有两根支柱,一是终身雇用,二是论资排辈。年功序列曾被人们视为儒教文化在企业中结出的硕果。年功序列在极大地增进了员工对企业忠诚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企业的劳务成本。日本政府在战后奉行的是高物价、高工资、高消费的政策,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日本就已经成了世界上物价最高的国家,80 年代中后期的日元升值又使日本的工资和物价急剧上升。在日本工业制成品风靡全球时,源源不断的外国定单有效地消化和转嫁了日

本企业昂贵的劳工成本,但从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先是亚洲“四小龙”,后是东南亚国家、中国相继成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国,它们不仅在本国市场上部分取代了日本的出口,而且还将工业制成品打进了日本市场。以廉价劳动力为后盾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攻势,使日本国内市场出现了“价格破坏”,日本企业的高杀?劣势再也无法掩盖,年功序列造成的高工资难以为继。同时,由于 IT 和其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对产品价格形成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经验和技能。年功序列相当大地妨碍了日本企业在信息时代的人力资源配置,拥有新知识、新技术的年轻人才或得不到发挥作用的机会和职位,或拿不到应有的报酬,从而严重地抑制了这部分最有生气的人才,人才资源的劣化又导致了产品升级的滞后。这就是 90 年代以来日本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中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日本经济“病”在体制上,这个体制就是“政府主导型不完全竞争”的经济体制。

二、体制调整与经济重振

体制调整是日本重振经济和社会的前提条件。

日本的政财界领导集团对上述由体制对经济造成的重压和制约并非麻木不仁、一无所知。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还处于巅峰时,就有人呼吁进行结构改革。1985 年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就启动了国有铁路民营化的改革,改政府主导为民间主导。但是当时良好的经济势头使日本领导集团中不少人不愿意、也不敢下决心去解决问题。直到泡沫经济破灭,日本领导集团才真正猛醒,经济的内外交困使他们不得不正视现实,设法着手解决问题。以此为背景,日本的政治体制出现了由“一党独

大”向“多党制”的演化；在政府管理上出现了“规则缓和”^④的呼声，行政改革正式起步；在经济体制上出现了以“金融大爆炸”^⑤为旗帜的动荡和改组。这三方面的改革表面上看互不相联，但实际上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简政放权、恢复民间活力，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首先，政坛的分化改组是日本体制调整在宏观层面上的表现。1993年7月，在是否要增加消费税的问题上，自民党内部分裂并最终下野，从此拉开了日本政党重组的序幕，迄今已有近10年的时间。10年中日本政界分分合合，众多政治明星都露了面，你方唱罢我登场，首相任期长的不过一年多，短的就只有几十天。虽然乱，但是其大体的轨迹是清楚的，就是要从自民党一党独占政权转变为英美式的两大保守党轮流执政。不仅是在野的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失意政客小泽一郎将此作为奋斗目标，就连在台上的自民党领导人小泉纯一郎等也都不讳言保守两党制。

日本政坛分化重组的实质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新的政体与之相匹配。原有的以自民党内派系斗争为形式的政治协调机制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的多元化、多样性的需要。日本主流社会中的各阶层、各集团之间巨大的利益差异和政策取向的分歧已无法被自民党内的派系间斗争所包容。以此为背景，相当部分的自民党内实力人物另立门户，从党内派别斗争转向政党间斗争。维持了近40年的“1955年体制”之所以在税制问题上而不是在其他政治问题上土崩瓦解，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现在活跃于日本政坛上大大小小数十个政党的头面人物，无论是在野的还是是在朝的，都出于原自民党田中派的理由也在于此。由自民党一党执政向保守两党体制转变，并不是纯粹的权力之争，而是国家最高政权如何更好地适应因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差异

的必然。

应该说,政局的大动荡为改变政府主导型不完全竞争的济体制做了广泛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几乎所有从自民党中造反出去的人都是打着结构改革的旗号自立门户的。从小泽一郎的“新日本改造论”到鸠山由纪夫的“民益论”,无不是在痛斥自民党的腐败和无所作为,大声疾呼“结构改造”和“规制缓和”,要求主动对日本经济体制动大手术。近年来日本国会通过的一些重大法案,如行政改革法案、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法案、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案等均为此目的服务。这些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和付诸实施,标志着以“规则缓和”为旗帜的体制和制度改革已经成为日本上下一致的共识。

其次,大银行竞相出售关联企业的股票是中观层次体制调整的先声。山一证券倒闭后,日本企业界出现了一个跨集团合并的浪潮。三井集团的核心企业樱花银行与住友集团的核心企业住友银行强强联手,组成新的“三井住友集团”。第一劝业银行与富士银行、兴业银行的合并则意味着芙蓉集团、安田集团和其他独立集团的大统一。外资的进入进一步打破了原有六大财团的格局,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兼并了马自达,法国的雷诺公司参股日产汽车,仅 1999 年一年间,外国资本共收购兼并日本企业 137 个,金额达 2.9 万亿日元。与此同时,连结决算会计制度的正式实施堵死了同一集团内大企业向中小企业转嫁经营危机的渠道。时价核算制度又使银行和大企业再难靠持有集团内企业的股票来维持虚赢实亏的局面。

跨集团企业的合并、外资的进入和会计制度的改变,从不同方面冲击了企业间相互持股的基础。以此为背景,近年来以银行为主体的大企业纷纷出售所持企业的相关股票。据估计,日本银行业所持有的相关企业股票总值约 44 万亿日元,2001 年度

已有 5.39 万亿日元的股权被出售,2002 年度内还将出售 4.8 万亿日元。

企业间相互持股的消解,使企业集团的存在失去了内在的粘合剂。过去那种以企业集团为组织形式的从生产到销售、从原料到成品的无所不包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产体制逐步瓦解。企业集团的瓦解在短期内会给日本众多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冲击,但由此产生的积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企业的法人治理将会由此完善,资本市场和股东对企业经营的严厉监督将会取代集团对下属企业的温情救助。脱离了集团而独立的企业将真正面对市场竞争,自担风险、自主经营,过去那种为集团利益而大量存在的非效率交易将一去不复返。

第三,能力主义薪酬制度的导入是微观层次体制调整的发端。1999 年 4 月,日本最有影响的企业丰田汽车公司开始实施“专业人才开发制度”。该公司领导人奥田硕明确表示,丰田公司要摒弃年功序列,转向能力主义,废除按资历定期定额统一加薪,改为按知识、按能力来发放薪酬。奥田硕发表谈话,说他不反对找一位洋人来当丰田公司的总经理。丰田汽车公司甚至还在一部分新招募的员工中试行全额工资制度,即把原来退休(职)时才发放的退職养老金及其他福利都均摊在月工资内直接发放,为跳槽员工解除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这一制度的实行极大地冲击了日本企业中传统的从一而终的就业观念,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内外的人才流动。

日本曾有“丰田公司变了,日本也会变”的说法。在丰田公司的带动下,其他企业也纷纷效仿。据大阪商业会议所对企业雇主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日本式的年功序列制度已经走向衰退的达 69.3%,在拥有 1000 名员工以上的大中型企业中持这一

想法的比例高达 85.3%,同时,认为应该采取美欧式的按业绩发放薪酬的比例为 57.1%。^⑩

虽然出于传统的观念和社会稳定的考虑,公开提出废除终生雇用制的企业还不多,但是,在严峻的经济不景气的压力下,终生雇用制实际上已趋名存实亡。早期退职已经成为大中企业的普遍做法,不仅大批 50 岁左右的员工变相失业,而且 35 岁左右的人也开始成为早期退职的动员对象。

上述三个层面的体制调整,说到底利益格局的调整。以政党重组为先导,以简政放权为主体的政治结构改革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官商结合的基础,而且相当大地震动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企业间相互持股的消解则引发了日本经济界的重组;年功序列的摒弃则使企业和雇员之间的利益出现了重新分配的局面。

多重的利益再分配使当前日本的体制调整出现了一个怪圈,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要使日本经济根本好转,不搞体制改革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在如何进行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意见又尖锐对立。一部分人持“改革先行论”,坚决主张只有先改革体制才能为经济的振兴创造条件;另一部分人持“景气优先论”,极力主张只有先把经济搞上去才有可能解决体制上的疮疤。这两方意见相持不下,旗鼓相当。由于日本政局动荡不安,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经常易手,每届政府都有不同的改革取向,一直徘徊在“改革优先论”和“景气优先论”之间。因此近十年来的日本体制调整一直处于进退反复之间,进展是有的,但是表面文章居多,实质性大手术甚少。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经济在低速中徘徊十多年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

三、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分工中的重新定位

产业结构调整是日本经济面临的又一根本性问题。

产业结构调整与体制调整互为表里,体制调整要解决的是日本经济重振的政治社会条件,而产业结构调整则是日本经济再起的内部动力。应该说,自泡沫经济破产后,日本企业界为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拓展新市场作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尽管日本经济为人诟病,但其制造业仍是世界屈指可数的。除家电外,日本的机床、工业机器人、半导体装置、锂电池、液晶显示器、CD-ROM 驱动器装置等的销售迄今仍在世界市场上稳居第一。日本的汽车业不仅成功地维持了世界第一流的生产水平和质量水平,而且还在环保型汽车开发上遥遥领先。作为日本传统强项的家电业的内涵正发生深刻变化,可再生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家电已经成为日本家电业的主力产品。日本昔日以音响家电闻名的索尼公司早就把自己改造成了信息王国。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日本对科研的巨大投入已有了初步的回报,2000 年度,日本的科研经费为 1305 亿美元,居美国(2280 亿美元)和欧盟(1650 亿美元)之后为第三位(若就单个国家来说,日本科研经费投入为世界第二位)。从 1981 年到 2000 年,日本在世界主要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仅次于美国,占论文总数的 10.1%^①。为了创造新的产业发展空间,日本将在 2003—2007 年间投入 3.05 亿美元的科研经费来研制供生产性产业和医疗福利机构使用的机器人。在日本企业界的努力下,技术上的颓势正在扭转,新的产业已在形成。一批新产业,如生命科学产业、环保产业、纳米新材料产业等已经基本形成气候。据日本政府预测,到 2010 年,日本的生命科学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 25 万

亿日元^⑫,环境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 35 万亿日元^⑬。日本为了缩短同美国在信息产业上的差距,提出了 E-Japan 计划,并且正在加速全日本的媒体网络化建设,计划到 2005 年全国 1/3 的县、市、町、村建成广域多媒体网,到 2010 年覆盖全国,届时行政服务、购物消费、教育医疗以及防灾等均可通过这个广域多媒体网络来进行,日本的信息产业将由此而跃居世界前列。^⑭

然而遗憾的是,上述为产业结构调整而做出的努力并没有从整体上激活经济,只是在局部上增加了一些亮点。这就使人们一边为日本经济持续走低而焦虑,一边又因这些亮点的存在而对日本经济的中长期前景充满期望。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不尽如人意,原因何在?从其民族性来说,似乎是其岛国情结陶醉于“one set system”生产方式不能自拔;从世界大势看,根子在于日本没有跟上经济全球化的前进步伐。

经济是从属于政治的,国际政治结构决定了国际经济利益分配的格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是冷战的产物,美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前苏联,刻意把日本当作西方的世界工厂来扶植,因而形成了日本经济以制造业为主干的格局。而日本的制造业是典型的一条龙生产方式,从服装、鞋袜到汽车、轮船,从口红、玩具到电视机、计算机,几乎无一不生产,日本人给这种生产方式起了个名字叫“one set system”。随着日本商品行销全球,日本人对自己的“one set system”生产方式钟爱不已,百般呵护,力图使之更细更全。为此,日本理论界更是制造出了诸如大和民族的双手十指特别灵巧、善于造物的经济神话。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东南亚国家经济开始起飞,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逆转。在此形势下,日本领导集团的一部分人已经看到了“one set system”生产方式与区

域经济合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提出了以产业技术梯度转移为核心内容的“雁行理论”。

雁行理论是著名学者小岛清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演绎而来的,目标是要按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发展水平进行梯度划分,形成产业技术由日本向周边辐射的格局。有人因此形象地把亚太地区的发展比作秋日空中的南飞雁阵:日本是亚太地区产业技术的领头雁,依次是亚洲“四小龙”,接下来是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在日元大幅度升值的推动下,日本的企业界也确实掀起过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在1985年至2000年的15年中,日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例由3%上升到14.1%(海外投资企业法人的销售额占国内企业法人销售额的百分比),增加了5倍,日本从亚洲国家的进口也相应增加了5倍。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金额高达2783亿美元,占GNP42746亿美元的6.5%左右,约三分之一的企业在海外有投资。^⑬

但“雁行理论”的提出和实施并没有成为日本对应区域经济合作、提升自身竞争力的致胜法宝。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雁行理论顷刻销声匿迹,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提及所谓的亚洲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在日本身上。首先,从雁行模式理论本身来看,虽然它承认并鼓励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的国际流动和组合,但是其核心仍然是垂直分工,在产业和技术进行梯度有序转移的背后是日本主导一切。然而,迅猛进展的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则是产业技术的水平分工、比较优势的积聚和转移所促成的多层次动态型相互赶超。

从理论上说,雁行模式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从实践角度看,日本人的岛国情结把冷战时的“one set system”生产方

式固定化、夸大化,以致丧失了其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合理定位。日本国内对“产业空心化”^⑩的忧虑几乎随着日本企业向亚洲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增加而高涨,产业空心化论者只讲因产业转移而给国内造成的失业上升、进口增加等消极因素,却不谈由此形成的新产业发展空间、国际分工对日本的调整产业的压力和推动。产业空心化论的高涨,诱导了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者和为政当局者们对经济全球化只采取消极防守不主动进攻的姿态,其具体表现是: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产业未推出过能与 70 年代风靡全球的家电产品相媲美的产品和技术,错过了日元大幅度升值带来的空前有利的产业结构升级机会。到 90 年代中后期,日本人终于尝到苦果,美国的新经济全面地压倒了日本的“one set system”生产方式。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日本人非但不能施援于处在水火之中的亚洲,反而为亚洲货币轮番贬值火上浇油,其国内经济更是因此雪上加霜,山一证券等昔日巨型企业砰然倒地。

简而言之,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和赶超美欧的成功等昔日辉煌的根本原因是其在当时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发挥了世界工厂的作用。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体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除了美国对日本在经济上由扶植转为竞争之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比较优势的发挥又夺去了日本继续充当世界工厂的基础。但是日本并未看到这一点,在防止产业空心化的口号下,继续只对“one set system”生产方式做修修补补。

直到 90 年代末,日本经济界的许多头面人物还在津津乐道地说日本民族是最擅长制造的民族,日本经济复兴的关键非生产制造业莫属。以此为背景,日本一些有影响的财界组织和智囊机构提出了以信息技术全面改造制造业的计划。用新技术改

造旧产业的话虽然不错,但问题是,这种改造究竟是集中力量寻找和建立在世界经济中新的制高点,还是对“one set system”生产方式进行修补?答案十分明显:“有所不为”才是“有所为”。不仅日本现有的人力和财力不允许无所不包的“one set system”生产方式继续存在,而且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技术创新的推动下,任何生产和消费都已高度国际化,每个国家只能在国际分工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不能一切全都由自己包揽,各国只能在全球化的生产链中找到自己能发挥作用的一个或几个环节。

由此可见,日本经济的重振,从结构的层面上讲就是要尽快破除岛国情结,摒弃“one set system”生产方式,在世界经济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在国际分工中找准自己的角色。只有这样,前文所述的由个别企业进行的种种努力才会有方向,才能形成合力,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才会有实质性发展,从而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四、日本经济双调整的前景展望

在找出了日本经济的病根、分析了其病因、考察了其治疗的手法和进展之后,就有必要、也有可能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前景做一个大致的判断。

首先,可以认为日本经济的双调整还只是刚刚起步,尚未进入实质性的调整阶段。从领导层来说,迄今为止尚没有提出一个既鼓舞人心又明确有效的调整战略。桥本龙太郎执政时曾提出过“金融大爆炸”的设想,准备从“重灾区”的金融业着手,引入竞争机制,但由于时机把握不当,最终无功而返。接下来的小渊惠三则“法先王之法”,照搬过去那套赤字财政的做法,试图以公共投资的大量投入来带动经济的全面复苏,即使小渊不是因病

殉职,这套办法实际上也行不通,现在被列为日本经济重症之一的国家债务超过 GNP 的 150 % 以上就是明证。

现任首相小泉是打着“结构改革”的旗号上台的,他执政后即成立了由主要内阁成员和财界主要领导人组成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并自任议长,仅 2001 年一年,这个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就举行了 35 次会议。2002 年到 7 月份为止,该会议又举行了 14 次,其声势不谓不猛,其决心不谓不大。但是从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制订公布的三个纲领性文件(即《改革工程表》、《结构改革与经济财政中期展望》和《关于经济财政运营和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的内容来看,小泉的改革只有空洞的口号而无实际的措施。这三份纲领性文件虽然明确把今后两三年作为日本经济的结构调整期,并呼吁国民忍受因调整带来的痛苦,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方针政策。

其实,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类似日本这样的全面调整早有先例。20 世纪 70—80 年代,美欧经济陷入滞胀的泥潭之中久久不能自拔,也曾出现过“欧洲失去的 10 年”和“美国经济 10 年彷徨”之类的说法。正是这样长期而艰难的调整才促成了西方经济的大变革。众所周知,英国经济回升的曙光是撒切尔夫人力排众议,毅然决然地打出的以民营化为主要内容的新保守主义;美国经济恢复的先声是出于里根政府大力推行以供应学派为主要政策取向的“里根经济学”。因此,日本经济的重振也非得有这样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新思想、新政策和新班底不可,只靠小修小补而不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先贤曾云:“工夫在诗外”。日本经济的重振不只在于对经济的“就事论事”,同时更需要从思想、文化、社会、体制和结构等各方面下工夫。

其次,可以认为日本经济的转型尚未真正起步。诚然,正如

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日本经济中已有了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但这些新的经济增长还不足以影响全局。从日本经济的运行来看,目前仍然未摆脱传统的格局。据日本银行 2002 年 6 月份发布的经济短期观察来看,从 2002 年第一季度开始,经济止跌回升,制造业中大型企业景气的好转感比前一季度上升 20 个百分点,这是 1974 年日本银行实施这一调整以来的最高增幅。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一是出口,二是公共投资,可见与过去毫无二致。自 1990 年以来,这样的止跌回升已是第三次,第一次发生在 1993—1996 年,第二次发生在 1999—2000 年,而这两次的回升最终都半途夭折。

现今的第三次也难有保持长期回升的可能。从出口看,日本 2002 年 1—3 月的出口比前一季度增加了 20%,^⑩回升幅度之所以这么大,一是因为日本政府自 2001 年秋天开始实施的有意识的日元贬值政策,二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刚刚开始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生产有所恢复而导致日本对其出口增加。可是 7 月份以后,美国经济再次受挫,日元由贬转升,亚洲对美国出口不振而使经济再次失速,日本出口的再次下跌势不可免。在此情况下,只靠公共投资来支撑的日本经济是难以真正复苏的。进而言之,公共投资已成过街老鼠,进一步增加公共投资不仅国会和民众通不过,而且在公共债务(国债和地方债的总和)超过 GNP150%的情况下,通过赤字财政来增加公共投资,事实上也不可能。

日本领导集团对这种情况是十分清楚的。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原真在一次演讲中就明确指出,日本经济目前的回升势头是难以维持的,因为日本经济还未从“外需依存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作为衡量是否是内需主导型经济重要指标的设备投资仍然处于下降之中,根据日本银行的法人调查,2002 年

1—3 月的设备投资,全行业下降了 16.8%,在电气机械方面减幅达 50%。^⑩

对此,中原真对日本经济的前景作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他说,现今的日本经济好比是一个即将升空的火箭,作为升空动力的,只是两个助推火箭,即出口和公共投资已经开始燃烧,作为主引擎的内需却无论如何也点不着火。这个火箭可能会离地升空,但随时会因助推火箭的燃烧殆尽而坠地。他感叹地问:什么时候才能让内需这个主引擎点火起作用呢?

改革已经开始,但尚未进入攻坚阶段;调整已有进展,但尚未触及关键部位。日本经济既需要在微观上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更需要在宏观上寻求思想和战略的突破,惟有进行大力度的“双管齐下”,多年来跌宕起伏的日本经济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责任编辑:张义素)

① “窗口指导”是对日本行政官员直接干预经济和企业经营方式的一种通俗说法。

② 亚洲“四小龙”指的是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

③ 日本一些经济学家把由亚洲廉价商品的进口所引起的日本国内物价水平下降这一新的经济现象称为“价格破坏”。

④ “规制”是日语中一个特定的词汇,一般是指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企业 and 国民活动进行的干预和介入,最典型的就是以审批方式进行的规制,还有与审批相伴随的限制性的行政指导、为维持价格水平等做出的制度性安排等。“规制缓和”就是要放松这些规制,简单地说是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⑤ 金融“大爆炸”(big bang)是指金融体制的根本性改革,这里特指桥本内阁“六大改革”之一的金融改革。1996 年桥本内阁提出《金融体系的改革——面向 2001 年东京市场的新生》,日本版金融“大爆炸”正式出台。

⑥ 『日本经济新闻』1999 年 12 月 25 日。

“连结决算”是指上市公司在披露财务信息时,不仅要如实公布本公司的财务状况,而且要如实反映关联企业(如母公司或下属子公司)的财务状况,以防止通过转嫁赤字或利润的办法来隐瞒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

“时价原则”是指上市公司在披露财务信息时,要按披露时点的市场价格来核估其所持有的股票、债券及其他金融资产。该原则的导入使上市公司利用金融资产购进时的价格与信息披露时的市场价格间的差额来虚报自有资产的做法成为不可能。

⑨ 『読売新聞』2002年5月27日。

⑩ <http://www.osaka.cci.or.jp>。

⑪ 《解放日报》2002年6月13日。

⑬ <http://www.nec.co.jp>, 2000年9月4日。

⑬ <http://www.kkc.or.jp>。

⑭ <http://www.soumu.go.jp/hakusyo/tsushin/index.html>。

⑮ <http://www.meti.go.jp/policy/trade-policy/investmentq-a/html/questions.html>。

html。

⑯ <http://www.kantei.go.jp/jp/sangyoukouzou/tyuukan/gaiyou.html>。

⑰⑱ <http://www.boj.or.jp/press/koen167.htm>。